

「美」朱莉·叶—威廉姆斯 著

黄瑶 译

一万天的

奇迹

一位抗癌女性的坚韧人生

THE UNWINDING OF THE MIRACLE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谨以此书
献给我此生的挚爱
乔希、米娅与伊莎贝尔

献给我深爱的姐妹
莉娜、南希与卡洛琳

献给曾为我拼尽全力的父母
叶世富与林桂英

献给陪伴我安全走向街道尽头的哥哥茂

所有人，都走在生命倒计时的路上，癌症患者有什么不同？

这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

二十年前，曾经在妇产科实习的我，被安排每天给一位腹股沟处有恶性肿瘤的中年女性换药。别人不愿意做，主要是因为气味太难闻了，一种鱼虾堆积在夏天闷热潮湿环境里散发的恶臭充斥着整个房间。那位患者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换药，这样会有人和她说话。聊家乡，聊亲人，聊美食，聊什么都可以——看似稀松平常的聊天，因为癌症而变得珍贵。

在急诊外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师带着一群我们这样的实习生，让我们实际经历处理病患的过程。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位身形瘦削的中年男子，症状是便秘和腹痛。老师让他在床上平躺，给我们示范腹部触诊，当老师触摸到患者腹部硬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老师眉头紧锁。老师坚决要求患者留下来，告知他肚子里有可能长了不大好的东西，但是患者执意要走，掷地有声地说：“工程图纸差一点儿就收尾了，死我也得画完图纸再死！”——日复一日的工作，因为癌症而

变得伟大。

《一万天的奇迹》让我回忆起了这些过往的经历，因为安静的文字引起了共鸣。显然，作者朱莉·叶－威廉姆斯并非老到的作家，她只是一位结肠癌患者，两个孩子的妈妈。但越是真实和显得稚嫩的文字，越让人可以感受到平静水面下暗潮汹涌的力量——对生命的渴望。她有遗憾，不能和相爱之人乔希走得更远，不能陪伴女儿米娅与伊莎贝尔成长，不能继续所爱的工作。但同时，也因为癌症，朱莉·叶－威廉姆斯宽恕了在自己两个月大时强迫父母毒死她的祖母，在祖母去世时，她放声痛哭。

因为癌症，朱莉·叶－威廉姆斯感恩先天性白内障给她带来的低视力，她因此会更认真和用心地看待景色。

因为癌症，朱莉·叶－威廉姆斯珍惜做饭、炒菜这些日常家务，享受和家人共度的时光，回忆旅游时的所见美景与所闻趣事。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她眼中有若珍宝。

如果说，之前的生命是一杯水，癌症则给朱莉·叶－威廉姆斯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加了一点儿佐料，让这杯水更有味道，更值得回忆。

北京眼科医生 陶勇

2021.7.22

自序

你们好：

欢迎大家阅读此书。

我的名字叫朱莉·叶－威廉姆斯。感谢你们的到来，我深感荣幸。这个故事是以结局为开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来了，那我就已经不在。不过，这没有关系。

我的生活十分美好，此生算是圆满的。与我所能想象的相比，或是与这卑微的出身所赋予我的期待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我成了一个女儿，一个妹妹，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一个朋友，一个移民，一个癌症患者，一名律师，如今又成了一名作家。我总是努力怀揣着明确的目标与善意去生活，尽管我认为自己也曾伤害过一些人。我会尽力过得充实而有价值，从容应对不可避免的磨炼，完整地展现自身的幽默感及对生活的热爱。就是这样，即便我在40岁出头的年纪便已行将就木、丢下两个宝贝女儿，我还是幸福的。

我这一生命途多舛，能在襁褓中存活就已是某种奇迹。而我竟然还得以来到美国，更是一个奇迹。在那场残酷的越南战争中，我们处

在失败的一方。出身贫寒、天生失明本已明确决定我的命运。虽然这一切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印记，但却没能阻止我成长。死亡教会了我许多有关生存的事情，让我在欣然接纳快乐的同时也去拥抱痛苦，让我能够清醒地面对残酷的事实，用双臂紧紧环抱那些艰辛的部分，也许这些正是我人生中不平凡的、让我的心灵得到解放的经历。

人人都会经历艰辛，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那些从新闻中或朋友处听来的轶事，那些发生在别处和别人身上、以死亡告终的悲剧，都会让我们在难过的同时感到庆幸，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毁灭性的龙卷风与地震、暴力枪击与爆炸事件、车祸，当然还有危害生命的疾病，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因为它们会提醒人类：你们的生命是有限的，面对那些能令地球颤抖或细胞突变、使肉体彻底失去控制的力量时，你们又是多么无能为力。

我即将落笔写下我的经历，其中既有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也有我承受过的种种考验——你们懂的。虽谈不上面面俱到，却也足以完整展示我走过的路与活过的世界。恕我冒昧地这样说：故事以记录迫近的英年早逝为开端，才会更有意义，也能成为献给你们这些活着的人的一种规劝。

朋友们，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生活吧。

从奇迹的起点，到奇迹的终结。

朱莉·叶－威廉姆斯

2018年2月

目 录

从越南到纽约	死亡 1	002
	生命	005
2013 年	概率	012
	伊莎贝尔	017
	战争与武器	022
	与上帝做交易	024
	癌胚抗原，PET 扫描，核磁共振……	029
	独自旅行的幸福	035
	秘密	043

	幸福的瞬间	060
	一次草药经历	066
2014 年	大地粗暴的束缚	074
	世界的交叉路口	079
	希望	085
	我迷失了	091
	一场噩梦	095
	上帝之手	101
	爱的故事	108
	命运与财富	119
	数字，重新评估	134
	得胜之时当得意	142
	癌症入肺	148
2015 年	从黑暗到光明	152
	“把一切都放进肚子里”	160
	我生命中的一天	165
	无敌	172
	梦想重生	181

	孤独	187
	线索游戏	193
	悲痛礼物	202
2016 年	登船赴美	208
	活着	214
	精神错乱	216
	奇普	226
	勇气与爱	232
	憎恨	239
2017 年	信仰，历史的一课	250
	家	255
	相信	259
	疼痛	263
	死亡 2	266
	准备	270
	爱	280

2018 年	走在生命的尽头	294
--------	---------	-----

后记	309
----	-----

致谢	319
----	-----

==

从越南到纽约

==

死亡 1



1976年3月，越南南部三岐市

我两个月大时，父母曾按祖母的吩咐把我带去岘港的一位草药医生那里，他们拿给老头儿根金条，让他调配一剂能让我永远睡去的药。因为对我的祖母来说，天生双目失明的我是残缺的，会成为家族的累赘与耻辱，将来也嫁不出去。况且祖母还一口咬定，她对我已是慈悲为怀了，让我不必凄苦地活下去。

那天早晨，母亲为我套上了几件陈旧的婴儿装。衣服上还沾着哥哥、姐姐留下的棕黄色粪渍，即便她已经搓洗了无数次，却还是无法洗掉。是祖母命令母亲为我穿上它们的。那时候她就站在我父母卧室的门口，看着母亲替我更衣。“给她穿别的都是浪费。”母亲为我穿戴整齐后，祖母开口说道。她仿佛是在肯定自己的指示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我要去赴死的行头。对他们来说，在如此绝望的时刻，在即将化作一具尸首的婴儿身上浪费一套上好的婴儿装是毫无意义的。

这出家庭剧发生在冷战的正中心。十一个月前，南方解放，地缘

政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压垮了叶家人的生活。

到 1972 年时，战势显然已经不利于南方。父亲心惊胆战，害怕失去他仅有的一点儿财产。这些财产可是他为一个自己几乎不曾有过半点儿民族自豪感的国家冒着牺牲的风险换来的。父亲在回家探亲的短暂时间里，从未对家里人提起过自己在四年的军役生涯中所见、所做的可怖之事。他的母亲通过贿赂为他谋得了为军队上尉开车的职位，试图让他远离战争的丑恶，然而事情并不像所有人希望的那么顺利。他发现自己驶入了敌军的领土，不确定哪里潜伏着狙击手，哪里埋着地雷，入夜后还只能睡在雨林中。他害怕出没无常的游击队员会趁他睡在雨林里时划开他的喉咙。在不堪一击的宁静被爆炸声撕破时他吓得拔腿就跑。最终，对死亡挥之不去的恐惧——或者更糟糕的，对像朋友一样遭遇断手断脚的恐惧——彻底战胜了他心中的所有荣誉感，也超过了被别人称为“懦夫”的担忧。一天，他以去吉普车里取物资为托词，走出了军营，再也没有回头。整整一个星期，他时而步行，时而搭车，一路回到了西贡（胡志明市旧称），躲进了华埠——一片居住了至少上百万华人的老旧区域。华埠熙熙攘攘，生活着许多不喜欢战争的人，这使他在藏匿的同时，得以在社区里自由地出入。

父亲设法将自己的栖身之处转告给了祖母。祖母不相信哪个男人能够矢志不渝，包括她的儿子，于是建议我的母亲前往西贡，与父亲团聚。就这样，母亲一手抱着两岁的姐姐莉娜，另一只手托着襁褓中的哥哥茂，来到西贡与父亲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直到战争结束。那时，父亲已经可以安全地返回三岐市，不必害怕遭到监禁，或是更糟糕——在急转直下的局势中被迫继续服役。不过，当下还不是再

要一个孩子的时候。

1975年4月30日，西贡解放。我的父母和其余的西贡人一同欢欣雀跃。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新的共产主义政权，而是因为战争终于走到了终点。在欢快的气氛中，他们迎来了我即将降生的消息。这之后，我的父母终于回到了三岐市的家。八个月后，在一月的某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体重三千克多一点儿（六七磅^①左右），按照越南人的标准来说我的体重重了一些，但还不至于让母亲和我在生产过程中遭遇什么生命危险。那个年代的医院脏乱不堪，剖宫产手术也行不通；没有人知道如何进行剖宫，也许只有西贡的医院才能做。父亲为我起名莉菁，用普通话读起来是“Lijing”，在海南方言中则是“Lising”，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是“茉莉的精华”。这个名字旨在表达一种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美好靓丽的意思。期待新生儿良久的母亲激动不已，我的祖母也一样——总之起初是这样的。两个月之后，我却被裹在哥哥、姐姐的旧婴儿装里，躺在父亲的怀中坐上了一辆北去的大巴，沿着一号高速公路踏上了两小时的岷港之旅。我被判了死刑。

① 1 磅≈ 0.4536 千克。

生命



2017年7月14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亲爱的米娅、伊莎贝尔：

我已经安排好了自己能想到的一切后事——以十分合理的价格为你们和爸爸雇好了厨师，还留了一份说明清单，标明了你们的牙医是谁、学费什么时候交、何时续签小提琴租赁合同，以及钢琴调琴师是谁。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还会录上几段视频，讲讲公寓的各个细节，好让大家都知道空气过滤器在什么地方，奇普吃的是哪种狗粮等。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举手之劳。在“哦，原来如此”的平凡琐事中，它们属于轻易就能解决且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我明白，作为母亲，如果不能努力平复我的离开带给你们的痛苦，如果没能至少试着说说年轻的你们可能会遇到哪些最重要的问题，你们恐怕会失望至极。你们将永远都是因癌症去世的母亲的孩子，人们会用同情与怜惜的目光看待你们（毫无疑问，这会令你们反感，即便大家都是出于好意）。如同崭新的静物画中一片扎眼的污

渍，母亲的去世将与你们生活的枝节交织在一起。环顾身边那些父母仍然健在的人，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就得因病逝去？这不公平。你们说着说着就会痛哭起来；遭到朋友苛待时，你们希望我能在那里拥抱你们；扎耳洞时，你们希望我能在一旁看着；举行音乐演奏会时，你们期待我能坐在前排响亮地鼓掌；大学毕业时，你们希望我会是那个坚持要再拍一张照片的烦人家长；婚礼那天，你们希望我能帮你们穿上婚纱；之后你们还希望我能从你们的双臂中接过新生的孩子，好让你们安睡。每一次你们渴望我时，都会重新经历一遍伤痛，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话能否缓解你们的伤痛。但我若是不去尝试，就是我的失职。

七年级时，我的历史老师奥尔森女士是个怪人，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我们这群青少年抱怨“这不公平”（比如她提出要进行突击测试，或是我们在玩所谓的“不公平”益智问答游戏）时，就时常遭到她的反驳：“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习惯就好！”

不知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认为公平应该常在，人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待遇与机遇也应该平等。成长在一个讲究法治的富有国度，我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期许。就连只有5岁的你们都会尖叫着呼吁公平，仿佛这是什么基本权利似的（比如伊莎贝尔能去看电影，米娅却不能去，这是不公平的）。可能这种对于公平公正的期许也根植于人类的灵魂与道德指南针中吧。我不确定。

我能确定的是，奥尔森女士说的是对的。人生就是不公平的。至少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在超越法律范畴的问题上，在无法被人力驾驭或操纵的问题上，在仅凭上帝、运气、命运或某些其他不可知、无

法理解的力量的问题上，期待公平的人也许是愚蠢的。

尽管成长的过程中并未缺少过母亲的陪伴，我却在比你们现在还要年幼的时候，就通过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明白了人生有多不公。看着其他那些能开车、能打网球、不必借助放大镜阅读的孩子，我心痛不已。这样的痛苦你们现在也许可以理解了。人们还会用令人厌恶的、充满同情的表情来看待我，剥夺我的机会。上体育课时，我在球场上永远都是守门员，从来没有正式参与过比赛。英语学校下课后，母亲觉得我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去学中文不值得，因为她认为我看不见汉字。（当然，我后来在大学里学习的就是中文，还曾出国留学，中文水平超过了我的哥哥、姐姐）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没有什么比以消极、可怜的方式“与众不同”更糟糕的了。我经常感到难过，还会在愤怒中孤独地哭泣。和你们一样，我也曾失去——视力的缺失使我失去了更多。我伤心欲绝，质问这是为什么，痛恨一切的不公平。

我可爱的宝贝们，在“为什么”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答案，至少此时此刻、此生此世还没有答案。但我真切地明白，若是你们允许自己去体会、去哭泣、去感受悲哀与忧伤、去受伤，痛苦与磨难会带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价值。穿越“火海”，出现在另一头的你们将是完整而更加坚强的。我保证，最终，你们会找到真理、美丽、智慧与平和。你们会明白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痛苦不是，快乐亦不是。你们会理解没有悲哀就不存在快乐；没有痛苦就不存在宽慰；没有残忍就不存在同情；没有恐惧就不存在勇气；没有绝望就不存在希望；没有匮乏就不存在感恩。人生处处都是悖论。生活就是在矛盾中艰难航行的一次历练。

我被剥夺了视力。然而，不幸的身体状况却使我变得更好。它非

但没让我沉溺于自怨自艾之中，反倒使我更加野心勃勃、足智多谋、聪明伶俐。它教会了我寻求帮助，而不是为自身的身体缺陷感到羞耻。它强迫我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和自身的缺陷，最后我也学会了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人。它还教会了我坚强。

你们即将失去母亲。作为你们的母亲，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护你们免受痛苦，却也希望你们能去经历痛苦，感受痛苦，接纳痛苦，并且从中有所得。你们要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强，因为你们知道自己的心里传承着我的力量；你们要因此而变得更富有同情心，同情那些独自经历着苦楚的人；你们要享受人生，享受人生中所有的美好，带着特殊的热情与热忱为我而活；你们要以一种过早失去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的心情，以你们对人生的跌宕与可贵的理解，去对生活心存感激。我可爱的女儿们，这是我向你们发出的挑战：将一出丑恶的悲剧化作美、爱、力量、勇气与智慧的源泉。

许多人可能不同意，但我一直相信、永远相信——即便还是个独自在床上恸哭的早熟小姑娘时——我相信我们此生的目标是尽力去体会一切，利用一生的时光尽可能多地去理解人类的境遇，无论人生长短。我们就是来感受人类的各种情感有多复杂的。有了这些经历，我们的灵魂就能得以学习、成长、舒展与改变，对生而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更多的了解。我称之为“灵魂的进化”。要知道，虽然先是双目失明，后来又罹患癌症，你们的母亲还是度过了精彩绝伦的一生，其中充斥的不仅是她“公平”获得的痛苦与磨难。我允许这份痛苦与磨难定义我、改变我，不过是朝着更好的方向。

在确诊癌症的这些年里，我体会到了曾经以为不可能拥有的爱与同情，还亲自见证、体验到了最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这些都令我深

感自身的渺小，激励我去做一个更好的人。我知道致命的恐惧会令人崩溃，但我却克服了恐惧，找到了勇气。失明与癌症教会我的事情数不胜数，但我希望你们在读到下文时能够明白，悲剧是如何以积极的方式改变一个人的，同时还希望你们能懂得苦难的真正价值。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在于他活了多少年，而在于他对人生的教训吸取得有多好，又是如何在这棘手的、多样的人生经历中去理解与提炼的。尽管要是换我来选，我肯定会选择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你们身边，但你们若是可以从我的离世中有所收获，能够因为我的离世而接受挑战、成为更好的人，就能为我的灵魂带来无上的欢愉与平和。

你们会感觉孤独寂寞，但务必要明白，你们并不孤单。没错，所有人的一生都是要独自走过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不过伸出双手，你们也是有可能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的。这样做能让你们感觉不那么孤单。这是人生的另一个悖论，你们要学会去驾驭它。首先，你们还有彼此可以依靠。姐妹的身份赋予了你们血脉的联系和一些共同经历。去彼此的身上寻找慰藉吧。永远都要原谅与热爱对方。还有也要爱爸爸，以及蒂蒂、茂舅舅、南希阿姨、卡洛琳阿姨、苏阿姨和众多的亲朋好友，所有认识与深爱我的人——他们都在惦记着你们，为你们祈福，为你们担忧。正是在这些人的关爱下，你们才不会感觉那么孤独。

最后，无论我将去向何方，总会有一部分永远陪伴在你们左右。你们的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液，继承了我身上最美好的部分。即便我的生命不在了，我也会守护着你们。

有时，我会在你们练习乐器时闭上双眼，好听得更清楚些。闭上眼睛，我常常会被这样一种清醒的认知征服：无论你们何时全情投入

地拉起小提琴或是弹起钢琴，音乐的特殊力量都会把我召唤过来。我就坐在那里，提醒你们一遍一遍又一遍去演奏，去数拍子，去调整手肘，好好坐直。然后我会拥抱你们，夸夸你们做得有多棒，我会骄傲的。我保证。即便你们选择放弃演奏很久之后，我也会在你们人生中某个充满激情与承诺、平凡又不平凡的时刻，来到你们的身旁。那时的你们也许正驻足山顶，惊叹美不胜收的景色，为自己有能力爬上顶峰满怀骄傲；或是正第一次怀抱着自己的小孩；或是正为某人伤害了自己柔弱的心而哭泣；抑或正痛苦地为了学业或工作熬夜。要知道，母亲曾与你们感同身受，并且会在那里拥抱你们，督促你们前进。我保证。

我时常梦想，自己去世时能够了解没有视力障碍的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还想眺望远方，看看鸟儿身上的细节，开开车。哦，多年双目失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拥有清晰的视力呀。我渴望死亡能令我圆满，赋予我此生缺失的东西。相信这个梦想一定能够成真。同样，我会在那里一直等你们，好让你们也能拥有自己缺失的一切。不过在此期间，好好生活吧，我亲爱的宝贝们。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你们要活得透彻，活得完整，活得有深度。你们要知感恩、充满勇气、充满智慧地活下去！

我会永远爱着你们两个，穿越时间与空间，直到永远。绝不要忘记这一点。

妈咪

==

2013 年

==

概率



这本来是一场家庭婚礼。2013 年仲夏，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洛杉矶，庆祝我年轻美丽的表妹最幸福的一天，我却没有去成。乔希与我带着米娅和伊莎贝尔从纽约飞来，本打算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一个月以前，我的胃部开始有些不可名状的不适，除此之外，我还总是感觉不太对劲。恶心、抽筋和便秘迫使我去了消化科医生，但似乎看不出任何显著的毛病。后来在洛杉矶，我开始剧烈地呕吐，表妹婚礼期间我都是在急诊室度过的。

结肠镜检查显示，我的横结肠中段出现了一片阴影，几乎将结肠完全堵塞了。《诊断学词典》中的词那么多，“肿块”是人们最不想从医生口中听到的词。还未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医生就十分笃定那是癌变物质，不过他们在深入检查之前还不能下定论。

结肠部分切除手术之后，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在康复室里醒来的那个瞬间。护士蒂姆和我的外科医生 D.C. 正在安慰乔希，让他为了照顾我也必须好好珍重自己的身体。蒂姆问他吃没吃晚饭。还没等乔希作答，他便从自己的晚餐中分了一块比萨饼给他。处于麻醉状态下的

我心里清楚，要是所有人都在过分关心乔希而非我——一个刚刚做完手术的人——那就一定出了什么大问题。

因此，当 D.C. 医生年轻的脸庞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情况危急吗？”基于病房里的氛围，我预想的答案是“是的”。

相反，D.C. 医生却答道：“不，不危急。情况很严重，但不算危急。”他继续向我解释说，肿瘤已被成功取出，但在我膀胱上方的腹膜区域发现了豌豆大小的癌细胞的种植转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从主瘤上扩散出来的。我暗自琢磨，好吧，听上去还不算太糟——豌豆大小的种植转移已经被移除了——那乔希为何要如此难过呢？

处于麻醉状态中的我躺在那里，任由他们的对话涌入耳朵，同时努力让自己更加清醒一些。D.C. 医生说，我不会记得今晚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可乔希却说他不太确定。我对自己笑了笑。与我相处多年的经历教会了乔希，我的脑袋就像一只捕兽夹，不管是否被麻醉，我都不会忘记任何事情（尤其是当某件事可以被我用来自我安慰时）。

老实说，那晚的事情我还记得不少。除了刚刚做完手术身体不适，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心想，手术肯定比预计的两个半小时更久，因为外面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记得哥哥和表妹来病房里探望过我。不过最重要的是，人人嘴里都挂着一大串的数字：一颗肿瘤扩散转移、四期、6%、8%、10%、15%、30 年的数据……

由于肿瘤主体已经扩散到了我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不管扩散的大小如何，它都会被归为癌症四期。结肠癌四期的存活率很低，大约为 6% 至 15%。那天晚上，D.C. 医生反复告知乔希，存活率的数据虽然是以 30 年的研究为基础的，但也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当我明白所有人关注的正是那些数字时，心里就理解了乔希如此

沮丧的原因。乔希热爱数字，能进行复杂的计算。我们交往期间，他曾多次问我：“你觉得我们结婚的概率有多大？”他能记住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开赛以来的每一届比分，也能记住 2009 年的温布尔登大赛上，罗杰·费德勒在第三盘第二局时曾以 3:5 落后。就像许多人一样，对他而言，数字在这个充满随机性的无序世界里建立的就是秩序。因此，当他得知妻子结肠癌已经到了四期，还能存活五年的可能性也许超不过 10% 时，他的痛不欲生是可以理解的。

那天乔希一直啜泣到了第二天凌晨。他躺在用两张活动躺椅拼成的床上，一遍遍搜索结肠癌四期的存活概率。在黑暗的病房中，平板电脑的光在他的脸上投下了一道怪异的光芒。他不想与我讨论数据，怕它们会令我难过。可乔希是从来不会对我有所隐瞒的——这也是我如此爱他的一个原因。

发现这些数字其实并未令我难过，他的反应是半信半疑。“那又怎样？”我问道。“你还不明白吗？”他质问我，想让我理解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乔希如此爱我，却还是无法理解我的一条基本准则，因为他不曾体会过我的人生。他不明白，我存在于这个星球本身就是数据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证据。数据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那天晚上，我让他把思绪拉回到 1976 年，我的家庭当时处在凄凉与绝望中，算算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能有多大概率摆脱难以想象的贫穷；又能有多大概率摆脱令任何男人都讨厌、不配给任何孩子做母亲的身体缺陷的耻辱？她心知自己对于高傲的家族来说永远都是负担，不得不被人照顾一生，却还要承受此等耻辱——这样的概率又有多大。

我还要求乔希算算这些：漂泊在令许多成年男子都会丧命的大海

上，一个小姑娘能够存活下来的概率是多少？视神经损坏多年之后，重获一部分视力的概率是多少？不顾无知家庭的低期望，获得学业成功，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全球最杰出的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发展自己法律事业的概率是多少？最终嫁给英俊有才的美国南部男子、还与他生育了两个漂亮女儿的概率又是多少？当然，乔希是算不出这些概率的。

他花了许多个小时阅读医学研究的内容，试图增加我存活的可能性。与肿瘤多处转移扩散相比，一处转移扩散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概率，我的年龄、健康水平也一样。我能够接受全球最好的医疗护理，同时又拥有完美的支援体系等事实也能加分。据乔希说，它们能将我存活五年的概率提升至 60% 左右。对他而言，这就比 6% 要强得多。

老实说，60% 在我听来也不是那么美好。事实上，任何低于 100% 的概率都是不够的。可众所周知，生活中没有什么是 100% 的。梅约诊所的出版物中写道，40 岁以下女性患结肠癌的概率是 0.08%——乔希之所以会把这种事情告诉我，是因为我本人是不会去搜索任何与数据有关的内容的。这一数据将因遗传或非遗传因素罹患疾病的女性全都考虑了进去。我的肿瘤没有显示出遗传迹象，意味着我患结肠癌的可能性还不到 0.08%。这位优秀的内科医生告诉我，他在 37 年的从医经历中，还从未遇到过我这么年轻的人会因为非遗传因素而患上结肠癌。我是不是该感觉自己十分特别？我有至少 99.92% 的概率患不上结肠癌，却一次命中。

所以说，数据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既不能提供保障，也不能充当恶化的根源。当然，要是我的癌症还处于第一期，且没有出现扩散转移，局面会更乐观。可即便成功概率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我也仍旧会输。凭借对统计概率的执念，乔希总会在处于劣势的人克服了困难、取得了足球或篮球比赛的胜利时告诉我：“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参加比赛的原因。”

好吧，我就是来参加比赛的。我选择不按赔率制定者的话来生或死。我选择不相信几个无名的研究者看着一堆客观数据计算出来的概率。相反，我选择相信自己，相信我的身体、思想和精神，相信身体里那些已然对克服困难这门艺术信手拈来的部分。《胜利之光》中，狄龙高中黑豹橄榄球队的教练泰勒就总是对不起眼的队员们说：“擦亮眼睛，全身心投入，不能输！”

我已经擦亮眼睛，全身心投入了。

伊莎贝尔



确诊后的 24 小时，每一次想到自己的孩子，我的身体都会被无情的啜泣折磨。我时常猜测女儿们未来会长成什么类型的女性。米娅肯定会成为一个明艳、敏感、冷淡的美女，伊莎贝尔则是个喜爱社交、魅力四射的暴脾气女子——一想到自己无法见证这些，我的胃就更难受了，心从未感觉这么痛过。一想到她们会悲痛欲绝地为我徒劳地哭泣，就为了让我能在夜里躺在她们身旁、用亲吻治好她们的小伤口，为了有个人——任何人——能像我一样那么爱她们，我就感到撕心裂肺的痛向我袭来。

为了自我保护，我不会再想象这些画面了，我让乔希不要把她们带到医院。在他无可奈何还是得把她们带来时，我都会将少有的几次探病安排得十分短暂。这样的场合总是令人不快，因为米娅无疑十分害怕妈妈身上插着的各种管子，进门没几分钟就想离开；伊莎贝尔也会因为撕心裂肺地尖叫被强行带离病房。我的两个宝贝已经成了别人的孩子。我知道她们正由我的父母和姐姐照料，还有一大堆的亲戚逗她们玩。这就够了。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什么也给不了她们，一直

处于确诊带来的震惊之中，我正努力让自己做好准备，从手术中恢复过来。

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在这场并非由我选择参与的战争中，两个孩子只能被我视为受害者。我们全都是癌症的受害者，而她们是最不应该受害的。

后来，可爱、活泼又淘气的伊莎贝尔——这孩子是癌症在我的体内滋长时在我肚子里长大的——开始让我得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

出院后，我们没有立刻返回纽约，而是在贝弗利山庄附近一栋配有家具的联排出租别墅中多住了两个星期。我想多花些时间在洛杉矶跟进医生了解情况、恢复元气，与通常没什么机会见面的亲朋好友待在一起。我父母的房子坐落在东边，不太方便。这座廉价的出租屋还算令人满意，只不过有些陈旧肮脏，急需翻新。但不论好坏，它都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搬进去两晚之后，在由和往常一样川流不息的奥林匹克大道返回出租屋的路上，伊莎贝尔突然用娃娃音说：“妈咪，我怕黑。”伊莎贝尔还不到两岁，说起话来往往口齿不清。这是她第一次提起怕黑的事情。我已经不再为她脱口而出的那些话感到吃惊了。因为她嘴里冒出的不少早熟的话都来自颇有洞察力的3岁半的姐姐。“伊莎贝尔，那里有很多盏灯，你不必怕黑。”我安慰她。

那天晚上，姐妹俩还是坚持要我和她们一起躺下来，尤其是伊莎贝尔。于是我在床沿上躺了下来，身旁的伊莎贝尔紧挨着米娅。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伊莎贝尔突然坐起身来，再次开口说道：“妈咪，我怕黑。”屋里虽然透进了街灯昏暗的光线，但还是很暗。“伊莎贝尔，

妈咪就在这里。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没什么好怕的。好了，躺下来睡觉吧！”她顺从地躺了下来，几秒钟后再次猛地坐了起来，一双敏锐的深色眼睛环顾着四周：“可是，妈咪，我看见鬼了。”这可绝对是头一回。

米娅说，她从未和妹妹提过鬼的事情。我相信她。几个月前，姐妹俩玩过把毯子蒙在头上的游戏。两人大白天跑来跑去，嘴里还“嘘”个不停。可即便是玩过这样的游戏，伊莎贝尔把鬼和怕黑联系在一起也让我有些出乎意料。

我一周前刚刚做完手术，真切地意识到死亡看上去有多迫近，心里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存在于屋里，被我的孩子看见了。

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伊莎贝尔在家时不时就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凝视着某个地方，眼神分明是在告诉我们，她看到了某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有一次，她还对着自己看到的那个东西问：“你为什么要回来？”

还有一次，我家长期雇用的保姆把电话放在了伊莎贝尔耳边，让伊莎贝尔和她的妹妹打声招呼。这样的事情保姆之前已经做过十几次了。在对方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伊莎贝尔就告诉保姆的妹妹：“我在这个房子里看到鬼了。”从那座房子里搬出来之后，伊莎贝尔就再也不会紧盯着一个地方看了，也没有再提起看到了什么。但我知道的是，我的伊莎贝尔是特别的。她的体内是有魔法的。

我出院之后，伊莎贝尔对待我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一度变得特别黏人。我把这归咎于自己住院期间与她分开了太长时间。最终，她的紧张情绪渐渐有所缓解。如今，她还是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紧紧抱住我十秒钟。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来说，

这已经够久的了。有时候，她还会走过来，在我的嘴上狠狠地亲上一口，然后张开双臂绕住我的脖子，紧紧抱着我。趁她打算溜走前的那一秒，我问她：“妈咪会没事的，对吗，伊莎贝尔？”

“是的。”她总是说。

伊莎贝尔还太过年幼，无法理解妈咪的病。但我相信她的灵魂中有一部分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拥抱我时，我能感觉到她似乎正把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赠予给我——她的希望，她的快乐，她的生命力。

我记起了高中时曾经读过的一首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永生颂》。诗中表达了孩子们生来便“曳着荣耀之云”，带着上帝赋予的天真、纯净与学识。成长的过程、社会与人生的腐蚀影响，剥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天使般的善良，也就是华兹华斯口中他们那“鲜花与青草中的荣耀流年”。

那我们成年人呢？这些早就错过了“曳着荣耀之云”“鲜花与青草中的荣耀流年”的人呢？我们当中那些（忽然）被破碎的梦想所伤害的人呢？那些面对疾病与即将到来的失去，眼看就要被内心的痛苦所吞噬的人呢？华兹华斯为我们留下了忠告：

尽管那曾经的灿烂光辉
已永远从我的眼中消退，
尽管没有什么能够重现
鲜花和青草中的荣耀流年；
我们并不为此悲伤，
而是继续探寻
某种活力

在残存的往昔中；
在那原初的、一旦萌生就不会泯灭的同情心中；
在那些源于人类苦难的精神慰藉中；
在窥破生死的信念中；
在那些孕育哲思的岁月中。

——华兹华斯《永生颂》

的确，借由从共同的苦难中产生的人类同情的纽带，对超出自己想象的事物心存信念，我们就不会为已经失去的东西悲伤，而是会在已拥有的事物中获得力量。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在拥有的事物中找寻力量，包括在强大的孩子身上重新发现魔法与奇迹，让他们帮助我们走过最黑暗的岁月。

战争与武器



真是讽刺，在拿到这份糟糕的确诊报告之前，我正处于此生的最佳状态之中——一个星期能锻炼五天。手术后三个星期，我就重新站上跑步机，奔跑了二十分钟。跑步的过程中，我对癌症越来越愤怒，开始破口大骂那些癌细胞：“你们怎么敢背叛我的身体！你们怎么敢扬言要把我从丈夫、孩子们和所有爱我、需要我的人身边带走？我会把你们揪出来毁掉的！”想象我缩到癌细胞大小，赤手空拳地绞杀它们，把手伸到了它们体内的DNA里。紧接着，我又想象化疗赋予我一把剑，让我能将它们碎尸万段，或者用一把枪消灭掉它们，可什么也不如赤手空拳将它们击垮那样令我满足。

化疗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有理由相信，越早开始化疗，疗效就越好。我将接受名为“FOLFOX”的治疗方案。方案包含三种药物，其中被称为奥沙利铂的药物最为强效。化疗常见的副作用有神经系统疾病（麻木与刺痛，包括手脚对寒冷极度敏感）、恶心、腹泻、乏累、免疫系统衰弱、生口疮、脱发。没错，脱发。呃……所以我得去买一顶假发了。

我每两个星期要去接受一次化疗。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奥沙利铂会被通过一个端口注入我的体内（端口将被植入我的上胸部）。然后我就要带着一只泵回家，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用它来输入另外两种药物。

医生极力推荐我调整成植物性饮食，戒掉精糖。他表示，这种饮食能够减少患癌或癌症复发风险的观点还没有任何精确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持，不过我想这也无伤大雅。最重要的是，医生说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满怀希望。对我而言，我的年龄、状态、所有可见癌症迹象都已在手术中被去除的事实，以及身体通过化疗取得的进步全都是十分有利的因素。请相信，面对自我怀疑与不确定的时刻仍心怀信仰——这绝对是应对癌症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但我不擅长心理战。过去的生活教会我的是如何做一个有几分无情的现实主义者。

与上帝做交易



我不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与宗教最接近的时刻就是曾经捧着母亲的仪式供品走过几次过场，为我们祖上的村庄世代代青睐的佛教神仙献祭，以及每月阴历初一和十五祭拜我的祖先。我站在水果前——春节之类的特殊场合还会有白切鸡、煎鱼和米饭——举着点燃的焚香，请神仙和祖先保佑我考试成绩全 A、考上自己选择的大学、全家大富大贵。

在曾祖母与祖母的葬礼上，当时 10 岁和 20 岁的我曾不假思索地模仿父母、叔伯阿姨、姑祖父和婶祖母们口中念念有词地鞠躬与跪拜。他们全都穿戴着白色的袍子和头巾。我并不了解这些仪式的哲学基础，而在我费心提问的那几次母亲又解释不清。除了春节，我的家族中没有人会去庙里，也没有人会阅读任何宗教文本。我们的准宗教做法很有可能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前的流行文化与农村神话传说，而非佛祖及其弟子晦涩难懂的学说。后者更近似于西方国家某些宗教的做法。在学校里，我不禁被那些宗教的一部分教义吸引了，因为我们在英语课上讲到的几乎每一首诗、每一出戏、每一则短篇故事和每一部

小说都会渗透一些圣经典故。正如我在历史课上所学的那样，正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影响了西方文化的进程。

于是，我开始逐渐什么事都相信那么一点儿，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与哲学生活方式。我相信祖先，相信他们的灵魂会守护我。我相信上帝，他也许不是《圣经》中所描绘的上帝形象，但也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存在。我觉得，上帝已经超出了我渺小而有限的人类大脑所能了解的范畴，但我无限的灵魂可能可以在最清晰的、被佛祖形容为“开悟外缘”的时刻开始有所领悟。为了简单起见，我把所有看不见的力量都称为上帝。

从小到大，我时常会对上帝说话（或吼叫），尤其是在那些不眠的夜晚，在我愤怒地质问时——那些问题几乎都可以被归结为“为何是我”。当然，这个共同的问题是我和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都会面对的。但谁都有各自的情况，不是吗？就我而言，为何我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为何我的一生就要被迫受先天失明的限制、永远处于无法发挥全部潜能的“诅咒”之中？毕竟我本可以成为优秀的网球选手、中情局的间谍或是雅克·库斯托那样的传奇潜水员。为何我所有的表兄妹和朋友们都能开车，就我不行？为何所有漂亮却无脑的女孩周围总是围绕着俊俏的男孩，而我却因为厚厚的眼镜片被敬而远之？没错，在我愤怒地对上帝发表的长篇大论中，伴随视力残疾长大所遭受的一切重创都成了我演说的素材。上帝有很多问题要回答我呢。

我会仔细聆听他的回复，在脑海中搜寻问题的答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找到了。我逐渐接纳了中国人相信的宇宙平衡观念。阴阳理论就是这一观念的印证（比如男与女，天与地，日与月、好与坏）。在宇宙的秩序中，万物皆会回归平衡，也终将——必须——

回归平衡。

于是，在那些不眠的夜晚，我与上帝达成了一项交易。“那好吧，上帝。如果你打算把这个烂摊子丢到我的身上，我就得要求得到补偿。我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恢复平衡。凡是不好的事情——你必须承认，这种程度的视力残疾已经很糟糕了——都必须要有好处来与之平衡。所以，我想要指定我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用你让我吃尽的所有苦头来换补偿。我想找到这世上最伟大的爱情。我想要某人用绝不妥协、无与伦比的感情来爱我，直到我生命的尽头。”这就是我与上帝一遍遍达成的单方面协议。

我想和大多数少女一样，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像我曾经读过的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中以及禾林罗曼史系列中的罗曼蒂克桥段。父亲禁止我阅读任何他用蹩脚的英语称之为“我爱你”的书籍，所以我会用白色的中国日历纸把它们的封面挡住。这样我就能独自幻想自己的白马王子了——父母不会读英语还是有些好处的。在与上帝要来的交易中，我之所以选择爱情，是因为爱情是不可企及的。爱情似乎超出了我的控制，完全依赖于时机与命运，不像取得完美的成绩那样，能够通过个人的意志与努力得到。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之所以认为爱情遥不可及，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可爱。我是说，谁会想要我这么一个生理有缺陷的人呢？谁会自愿被我的缺陷束缚呢？哪个性感的男人愿意到处载着我，为我读菜单，扶我下楼梯，还无法参加网球之类的夫妻运动，让亲朋好友盯着这个戴着厚眼镜的呆丫头呢？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吧。

然而，上帝接受了我的交易！

他把高大、（有些）黝黑、英俊而又聪慧的乔希带进了我的人生。

多年前的曼哈顿下城区，某座奢华的摩天大楼 43 层，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南方男孩就这样毫无戒备地走进了视障越南移民女孩的办公室——这种貌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宇宙的力量却让它发生了。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找到乔希的这种爱情——一种从一开始就要经历可怕的挑战、从而愈发坚韧的爱情（就像我们此刻面临的生死挑战一样）。从一开始，我就一直以为乔希拥有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心（尽管我们两个人都有缺陷），于是我曾试图且仍在努力保护他的心不受任何人和事的威胁。为了这个永远爱我的男人，起码这一点我是能够做到的。毕竟他总是能确保我的水瓶里有水；要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便会叫我上床去睡；他还总会为我阅读菜单，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个男人爱我就如同我爱自己。

但我无法保护他远离癌症和一切我不能掌控的事情，无法让他摆脱对没有我的生活的恐惧，也带不走他无助的感觉。我不能向他保证自己可以赢得这场战争，我恨透了癌症给他带来的影响，我讨厌它害他落泪，惹他发火，令他绝望。比起癌症对我的影响，我更憎恶它给乔希造成的伤害。

自从被确诊以来，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分子似乎都充斥着对乔希和我所爱之人的担忧。他周末为何要睡那么长时间？他有没有可能得癌症？他抱怨时说的手腕痛和消化不良会不会是癌症的预兆？同样的恐惧也存在于我注视孩子们的目光中。伊莎贝尔那次失去平衡是不是因为得了脑癌？米娅那天的大便看上去不太一样，是不是也是因为癌症？癌症的行踪是如此诡秘，以至于会攻击你每一个清醒的想法。与其说它是一种疾病，不如说它是生存的敌人，能让身体与我们反目成仇。我曾经拥有的微乎其微的安全感，如今已经彻底被粉碎了。癌

症之类的疾病只要发起一次进攻，就会不断卷土重来。对此我心知肚明。

因此，在夜里辗转反侧时，我的脑海里都有个声音在尖叫着，不知道接下来我和家人还会遭遇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和上帝达成了另一项交易，又回到了很久以前关于好坏平衡的问题。在一个我无法控制的世界里，除了对上帝说话、尖叫、咆哮和乞求，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我告诉他：“如果你再这么糟蹋我，如果你还让我的人生面对更多讨厌的事，那好，我能应付得来。你知道我能。可是我的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我爱的每一个人——请放过他们吧。见鬼！放过他们！你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好了。你敢动他们试试！”

癌症互助小组里的一个女人告诉我，与上帝做交易就是我的祈祷方式。我倒是从未这样想过，因为我总是与上帝针锋相对。可不管是祈祷也好，交易也罢，他都答应了，并且信守了诺言。显然，我是无法指使上帝去做任何事情的，而生活显然又存在着某种必然，比如衰老所带来的疾病与死亡。不过上帝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次，我希望他也能信守诺言。